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五期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1c)

【文革一幕】	“文革”中“群众专政”亲历记	孟祥才
【史海钩沉】	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王民伟
【人物春秋】	叶向真：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	周海滨
【历史见证】	我参加彭德怀专案组的外调工作	汪春耀
【史实考证】	中共十大后中央军委组成情况考析	黄力民
【文献资料】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许广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一幕】

“文革”中“群众专政”亲历记

• 孟祥才 •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一个又一个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组织个个打着“革命”的旗号，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打、砸、抢、抓、抄、戴高帽挂牌游街、各种花样百出的批斗会、低头弯腰喷汽式，林林总总，洒洒扬扬，形成了旷世的大观。真有必要编一部《“文革”词典》，将这些“创新”的“杰作”收进去，为后人研究“文革”史提供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否则，后人面对这些东西，会如坠五里雾中的。

在“文革”中，不知哪个群众组织首先创造出了“群众专政”这个名堂，为一些所谓群众组织的一系列违法活动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群众组织可以将任何人以一个捏造的罪名抓起来，关入私设的监狱，滥施刑罚，审讯定罪。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群众专政”过，这恐怕是永远搞不清的历史悬案了。与“群众专政”相联系的还有个“群众扭送”，就是由群众组织将一个他们认定的“专政对象”送到公安局或卫戍区这些国家设

立的治安执法部门，这些部门也对人犯予以接收，实际上是双方商定好的一种变相逮捕。这样做，即使以后专政机关查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罪行”，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就是上级追究下来，只要将责任推给“扭送”的群众组织，也就可以搪塞过去了。例如，“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傅崇兰就是以“群众扭送”的方式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的。可事后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犯下应该逮捕入狱的“罪行”，于是在蹲了近八年的监狱之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我在“文革”中曾三次被“群众专政”，对这个“新生事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共有三派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属于大批部。“文革”开始不久，联队占上风。因为该组织与王力、关锋有联系，所以在1967年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垮台而垮台。此后大批部占上风。1968年2月，戚本禹垮台，大批部因为与戚本禹有联系（这种联系我在《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也随之垮台。总队占了上风。这时傅崇兰已被扭送至北京卫戍区，我们这些大批部的头头也就成了总队批斗惩罚的对象。为了逃避惩罚，我们几个头头不敢回自己的单位，就在外面流浪了几天。后来，我们觉得老在外面流浪不是办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自动回到各自的单位。这时候，总队自以为大获全胜，就开始清算我们这一派，主要是我们这些头头的“罪行”。我被隔离在位于沙滩的法学所，在一个房间中被监禁起来，不断交代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被“群众专政”。

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我在被批斗、交代中度过了约一个月的日子。说实在话，开始时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批斗，还真有点难为情，但时间长了，脸皮厚了，也就无所谓了。在此期间，对我们一派组织的那些所谓“罪行”，如我们“文革”小组、革筹小组的活动，特别是与戚本禹的联系，我基本上都做了比较真实的交代。在我们垮台前的应变中，我们曾让王玉欣在他妻子工作的北医三院隐藏了一批尹达的材料，这时我也让王交了出来。

1968年3月，“文革”中的又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发生了：党中央宣布揪出军内“反党集团”的成员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时间，“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贴满了全国各地，社会上凡是与他们联系比较紧密的群众组织也都成为被怀疑和揭发的对象。我们一派群众怀疑总队可能与“杨、余、傅”有些联系，于是乘机再起，重新拉起队伍，与总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处于隔离状态中的我发现总队对我的监管有所放松，我们一派的人就示意我赶快“自我解放”，站出来重新与总队继续斗争。我于是未经总队批准，自己从法学所的隔离地跑回历史所。然后，我贴出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戴罪立功”。这样，我就自己结束了这一次“群众专政”。说实话，这次一个多月的“群众专政”，对立面对我还比较客气，没有打骂逼供，只是限制我的自由，不准离开监禁地。

自我解脱后，我就与我们一派的主要骨干分子一起向总队发起了猛烈进攻，以大字报和召开群众大会声讨的方式，追查他们与“杨、余、傅”的所谓黑关系，一时间将他们搞得非常狼狈。因为我们重新拉起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年轻而精干，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我那时写大字报可以说“量多而质高”，我写，一帮年轻伙伴帮着抄，一天可以贴满半个学部大院，在学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立面为了打垮我们这一派组织，决定拿我开刀，于是精心策划了绑架我的行动。

4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思想史研究室的办公室里写大字报，栾成显跑来对我说，据确切情报，总队今天晚上要对我采取行动。我们几个人——栾成显、沈定平、黄秉枢、毛凤鸣一起商量，决定赶快离开历史所，回到建外我们的宿舍，以我们住的单元房为基地，由他们保护我与总队对抗。于是，我们几个人迅速离开历史所。而此时，我们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中，在我们离开学部大院回到建外宿舍的时候，历史所我们对立面的人就尾随我们到了建外的同一座楼的同一个单元。我们在三楼，他们在二楼，从楼梯上堵住了我出逃的路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明白自己犯了严重轻敌的错误：对立面当时是学部的当权派，他们不仅掌控了学部的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能够调动学部的相当一批人力资源，我们当时的力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这时，栾成显还天真地认为，总队的人马都集中于楼前，我可以抓住一根绳子从楼后逃出去。待他拴好一根绳子让我下楼时，我发现楼后也布满了他们的人。这时我已经意识到凶多吉少。很快，他们开始砸门，沈定平等在门内拼命顶住，不让他们冲进来。无奈他们人多势众，十几个人砸坏房门冲了进来。这时我一个人在这套住房的一个房间中，听到大门被砸开的声音，我就顶住最后的一道门进行无望的抵抗。他们冲进第一道门以后，先将沈定平等人抓住，然后就开始砸我所在的房间的门，很快这道门也被砸坏，三四个彪形大汉冲进来，将我打倒在地，之后拖着我的脚，以头着地，从三楼一直拖到楼下，塞进一辆汽车里。学部机关一个凶残打手骑在我身上，就这样将我拉到法学所，在二楼靠东边的一个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关了起来。由此，我开始了五个多月的被监禁的生活。这是我第二次被“群众专政”。在这次绑架我的过程中，历史所我们对立面的人一直没有露面，这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即使将来找不到我的任何“罪行”，他们也可以说抓我的事是“总队”的其他人干的，与他们没有关系。1968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后，办两派团结学习班的时候，我们对立面的一个头头当着我的面“斗私批修”说，那次绑架我，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罪恶”，而是因为我在我们一派中“身先士卒”，能量很大，绑架我是为了削弱我们一派的力量。不过，后来到1969年秋大抓“五·一六”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作为“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已是“板上钉钉”，于是又得意地宣告，绑架我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行动”。

对立面满以为抓起我来以后，我们一派就垮台了。但他们错了，他们的镇压不仅没有摧垮我们的组织，而且进一步激起我们的反抗。我后来听说，我们的组织第二天就在学部大院刷满抗议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续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被抓起来以后，即对他们以绝食表示抗议。他们每天有两个人对我进行看管，我不理他们，双方怒目对峙。一连两天，只要他们找我谈话，我就表示抗议。两个夜晚，我很少睡觉，耳畔不时传来其他房间被审讯者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这才明白，当时的法学所已经成为总队私设的监狱，被他们抓进来的人，不死也要褪层皮。面对这种情况，我在苦苦思索一个保全性命、寻机逃出牢笼的办法。第三天晚上，已经因绝食虚弱不堪的我突然被四五个暴徒围起来一阵毒打。他们几拳就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再拉起来再打倒在地，有一个人用我穿的鞋底猛打我的脸，另一个人则以他硕大的拳头猛击我的前胸后背。他们并边打边要我承认反对康生——历史所有一个“反康老小集团”。我明白，他们一定要将我打成一个“反康生分子”（因为康生当时是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五号人物），这样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学部不明真相的群众宣布，他们抓我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了。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拉起来再打倒的过程中，我明白他们是要通过严刑逼供的办法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不顺从他们，当晚就有可能死在法学所。权衡再三，我感到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是不明智的，唯一的办法是先顺着他们，保住生命，然后再找机会揭露他们的暴行。我于是承认了我反对康生的“罪行”。虽然后来此人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凶残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仍然将他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压根就没有怀疑过他有什么问题，更没有天胆反对他。在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以后，我估计他们对我采取的措施不外乎两种：一是继续监禁，到一定时候再宣布对我的处理，这种可能性较大；二是将我打死，再公布我的“罪行”材料，并宣布我是“畏罪自杀”，这种可能性较小，但

也存在。为了对付出现第二种可能，我偷偷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反康老案，千古奇冤”16个字，放在三角裤衩的一个小兜里保存起来。目的是希望我死后公安人员在尸检时能够发现，以便使他们草菅人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说实在话，他们虽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但在我身上他们又很难找到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过硬的材料。当时他们掌握的唯一材料是我曾从学部档案室抄录的一份康生在1961年学部召开的“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这份讲话稿是1967年夏天批判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时我到学部档案室查找有关材料的时候发现的，其中康生大讲“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这句话能与当时被定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联系起来，我认为可以作为一个背景材料搞清尹达在“香山会议”前后的活动，所以就抄了下来。这份材料后来落到我们所的对立面手里，他们就认为抓住了我反康生的最重要的佐证，引导我承认抄录这份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康生。他们在得到我承认反康生的“罪行”后，如获至宝，反复向人们宣传我的所谓“罪行”，以显示他们抓我的高明。

在此期间，主审我的是哲学所的徐姓助理研究员，他在“文革”后一度声名大振。此人是逼供诱供的高手，硬说我参加了以高全朴（历史所的工作人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为首的“反康生小集团”。他每次都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掌握了我的“过硬材料”，诱使我就范。一次，他阴阳怪气地审讯我，说：“你除了反康老外，还反谁？”我说再没有反谁。他于是学着广播的腔调说：“敬祝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王效禹万臭无香！万臭无香！这话是谁说的？”我说这话不是我创造的，是我春节回济南，听济南人讲的。当时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已经当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对着干，每次广播的开首词都是：“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王效禹万臭无香！万臭无香！”我回北京后对一些人当笑话讲了。徐疾言厉色地说：“王效禹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你传播这些东西，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以后每次审讯，徐都得意地重复几次“黄月亮”，以显示他们掌握了我的所谓罪行材料。在我承认“反康生的罪行”后，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开始出现，对我的批斗也开始缓和。我乘机向他们说明，不久前我承认的所谓“反康老”的罪行，除了抄录他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是真的外，其余的交代都是被逼供的结果。他们对我的反悔虽然很不满意，但没有再对我刑讯逼供。其实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有什么“滔天罪行”，在他们看来，只要将我抓起来，削弱我们一派组织的力量，他们的目的也就基本达到了。再说，有我抄录的康生在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在他们手上，他们完全可以深文周纳、上纲上线，任意编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我的“罪行”，也就能构成他们抓我并对我进行“群众专政”的理由了。

在这个私设的监禁所里，我一方面在表面上顺从麻痹他们，一方面寻找逃跑的机会。因为隔三差五传来的被刑讯者的喊叫声都在提醒我：留在法学所这个私设的监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必须尽早想法逃出去。但我也明白，对逃跑的策划必须万无一失，确保成功，否则，一旦逃跑失败，不仅一顿毒打在所难免，而且很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必须小心从事。对我的审讯持续了20多天以后，他们认为在我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就将看管我的任务交给了历史所的人。开始是一个年轻的工人，他特别忠于职守，生怕我逃走他负不了责任。每晚睡觉时他都把行军床顶在房门上，他躺在上面睡觉，我想从房门出去根本不可能。而窗户已经被从外面用木板钉死，从那里逃出也不可能。就这样到了6月份。不久，换了一个看守，他是历史所的一个合同制的工人，工作是每年冬天烧取暖用的锅炉。他姓胡，黑脸上布满麻点。他对我们这两派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谁掌权他就为谁服务。这次奉命看管我，他实际很高兴，因为由此他就可以不去参加体力劳动了。

6月份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关我的房子在二楼，窗子向东开，从早晨开始就接受强烈阳光的照射，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酷热难耐，尤其到了晚上，晒了一天的小房内本来气温就高，再将

门窗关死，空气不流通，温度更高，这使我们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汗流浹背。我于是对他说：“我们何必这样活受罪？我建议打开一扇窗子，把门也打开，使空气流通。反正你每时每刻都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出去。”开始他白天开门，晚上睡觉时仍将门关上，把行军床顶在门上。后来我建议他晚上也敞开门，他说：“那可不行，你跑了怎么办？”我说：“你看法学所门口一天24小时都有看门的，我能跑出去吗？你再看四周的高墙，我能爬过去吗？再说，你晚上睡觉，将行军床横在门口，我要从你身上迈过去，你能不觉察吗？”他见我说得有道理，并且见我每天都顺从地服从他的管理，对我逃跑的警惕性越来越低了。特别是，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非常喜欢听历史故事，我就每天讲故事给他听。我们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每天买点菜，我们也一起吃。因为他是老北京，也经常给我讲点过去北京的风俗人情。这时，我利用他对我放松警惕的机会，开始勘察逃跑的路线。因为法学所的大门24小时有人站岗，从那里不可能出去。院子的南面西面是楼房，也不可能找到逃出去的路。东面是一面墙，跨过去就是沙滩西街，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逃跑路线，但由于墙高且上面还有铁丝网，没有飞檐走壁的本事是不可能跨越的。唯一可能的出逃路线是北面的院墙，这里的墙虽然也很高，但依墙建了一排停放自行车的棚子，如果上到棚顶再翻越北墙就比较容易了。我利用大小便的机会对这个棚子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棚子比较牢固，可以作为上墙的跳板，而从一楼厕所的窗子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车棚。只要能够从关我的房间出来，再从一楼厕所窗子攀上车棚，越过北墙就是沙滩的北小街，向西就是景山东街，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跑了。经过多日的反复勘察，我知道这是逃出法学所的唯一安全可行的路线。

在确定了逃跑路线以后，我又反复思考逃出法学所以后离开北京的路线。我估计，一旦他们发现我逃走，肯定四处追捕，而首选目标肯定是北京火车站、永定门火车站和北京长途汽车站，因此，这些地方不能去。丰台火车站和黄村火车站估计也是他们堵截我的地方，看来也不能去。我想，他们在考虑我的逃跑路线时不会想到我会向西去，因为我要逃回山东必须经过天津，这就只能向东或向南走。我向西去找一个合适的车站再乘车经天津回山东，可能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为此，我千方百计地希望找到一张《北京地图》。说来也巧，关我的房间是法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南北两面墙摆着书架，上面摆满法学方面的书籍和一些杂书。我于是天天抽看这些书消磨时光。一天我翻到了一本薄薄的历书，在其封二有一张《北京地图》，我如获至宝，立即仔细察看，发现从广安门有一路公交车到北京西北方向的三家店，而它正是京张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如果先到这里，再从这里乘开往天津的火车，安全系数将是很大的。我又反复对比了其他一些路线，觉得这是一条最好的逃生路线。

在确定了逃出法学所的路线和离开北京的路线以后，我就开始寻找逃跑的时机。夏天酷热，人们一般在夜里11时前不易睡熟，所以逃跑的时间应选在12时以后。同时还必须等看守我的老胡彻底睡熟，我才能从他的身上迈过而不被发觉。我决定将逃走的时间选在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当天下午，我开始进行逃走的最后准备：将一件毛衣和一套单衣打成一个包袱，将100多元钱装在裤兜里（在我被监禁期间，由于我们所的会计是我们一派的人，我每月42元的研究生助学金还能按时送到我的手里，这给我的逃走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便利），内心紧张地等待深夜的来临。为了使老胡睡熟，我从晚饭后开始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我绘形绘色地讲，他如痴如醉地听。就这样一直讲到近12时，老胡有点困了，说：“咱们明天再讲吧，我想冲个澡睡觉了。”我说很快就讲完了，等会儿咱们一起冲澡。我又讲了约一刻钟，看到老胡两眼都睁不开了，就说今天讲到这里，明天接着讲。这时老胡连澡也顾不得冲就躺到拦门而放的行军床上，并且很快进入梦乡，均匀地响起了鼾声。我将灯打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在确定老胡已经睡熟的情况下，我开始实施逃走的方案。我悄悄地起身，将包袱斜挎在身上，借助窗子透过的微弱的光线，几乎不出声音地赤足从睡在行军床上的老胡身上迈了过去。然后，又几乎不出声音地从二楼下到一楼，进入厕所，穿上鞋，从北窗户攀到自行车棚上。正在我快步向前准备抓住墙上的铁丝网时，车棚不堪负重，我一只脚踏了一个窟窿。也是急中生智，我迅速躺倒在车棚上，滚到了北墙的铁丝网边。我抓住连接铁丝的钢筋，站到墙上，希望看清北墙下的地面，以

便选一个安全的落地点。但当时的沙滩北小街连路灯都没有，下面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已经顾不了许多，即刻迈过铁丝网，跳了下去。由于铁丝网太高，我迈过时裤子划了一个洞。更由于北墙太高，落地时没有双脚同时着地，先着地的右脚崴了。当时感到右脚很疼，我担心脚腕骨折，果真如此我就逃不掉了。我赶紧摸了一下右脚腕和右脚，发现没有骨折。站起来走了几步，感到虽然右脚很疼，但勉强还能走路。我就忍着疼痛，快步走到景山东街，希望找一个三轮车送我到广安门。当时正值深夜1时左右，是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虽然马路边有几个三轮车工人躺在车上睡觉，但当我求他们拉我的时候，他们全都拒绝了。面对睡觉和挣钱两种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睡觉。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不能停留，没有三轮车送，我也一定要走到广安门。

好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几年，市内道路基本熟悉，我于是决心凭双脚走到目的地。我沿着景山东街向南走到故宫北边的汉花园街，西行过北海大桥，沿文津街向西走到西四，转而沿西单大街向南走到西长安街，再向南走到宣武门，沿着宣武门外大街继续南走，经菜市口走到了广安门内大街，折而西走，就到了广安门公交车站。这一段路大约20里，我走到广安门的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距早班公交车发车的时间5时半还差一个多小时。我怕有人追到这里，也不敢在公交车站候车，就找了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在一个砖垛旁边隐蔽起来，静待第一班车的到来。5时半，开往三家店的第一班车上路，我迅速跳了上去。看着周围模糊的建筑物，我明白自己基本上脱离危险了。到三家店后，我简单吃了一顿饭，就在候车室静等由张家口方向开来的至北京的车。我买了一张到济南的票，很快就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普通客车，车到丰台站，我下车不出站，就在站台上等来一列去天津的车。我乘此车到天津后，又没有出站，就转乘了一列开往济南的火车。车到济南站已是下午3时左右，我不敢去24中我妻子那里，因为这个地址历史所的人知道，如果他们跟踪追击，我们就可能在那里撞上。于是我在车站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妻子，让她迅速赶到车站与我见面。从4月初我被抓走，我就同妻子中断了联系，她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道我被总队抓起来的消息，终日担惊受怕。这时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已经逃了出来，喜出望外。她立即赶到车站，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我既不能在济南24中住下，也不能回老家，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锁定的目标，比较安全的地方是益都（今青州）农村我岳母家，这个地址他们还不知道。决定去处后，我立即乘上去益都的车东行，约下午5时，我在益都站下车后，又雇了一辆三轮车，6时左右就到了我岳母家。至此，我的出逃告一段落。住在岳母家里，我恢复了与我们一派的联系，同时将我在法学所遭受的刑讯逼供的情况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材料寄给他们。我们一派的人于是将我写的材料抄成大字报贴到学部大院，使对立面十分被动。这就是我第二次经历的“群众专政”。

我在岳母家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没有到我老家和我妻子所在的24中抓人，估计他们顾不上我。再说，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不要参加对他们的斗争，我离开北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没有兴趣追捕我了。于是我在9月份到了济南24中我妻子那里，通过书信与我们一派的朋友保持联系，随时了解学部运动的情况。到1968年底，我的同派的朋友告诉了我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的消息。我以为遇到了救星，归心似箭，就在1969年元旦前的12月30日回到北京。工军宣队全权领导运动，开始搞“大联合”、“消除派性”、“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我都积极参加，并在批判派性的时候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清了自己在运动中的问题。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三次时间更长更为严厉的“群众专政”正等待着我。1969年10月，学部开始大规模的清查根本就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先是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接受了长达九个多月的逼供信的审讯。以后，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到河南明港军营，1972年回北京，直到1974年底做出“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群众专政”状态，失去人身自由。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在《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发表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述。这就是我第三次经历的“群众专政”。

粗粗算起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有近六年的时间是处于“群众专政”的状态中。这一亲身经历告诉我，在“文革”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中，“群众专政”应该是最坏者之一。因为它是群众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对任何无辜者随心所欲施暴的手段。它可以随便给一个人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头衔，关入私设的监狱，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制造出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使许多伤天害理的残害异己者的暴行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暴行”，它又比较容易在“法不责众”的思维定式下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危害极大。

“文革”中“群众专政”的实践表明，任何超越正常法律约束的“专政”，不管打着什么“正义”的旗号，呼喊着什么动听的由头，最后一定导向暴政。即使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下，“群众专政”也是害多利少，与之相伴的必然是数不清的冤案。“群众专政”是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歪理邪说下产生的一种超越党纪国法的专政形式，在历次运动中屡屡出现，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彻底予以否定。

□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

~~~~~

## 【史海钩沉】

### 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 王民伟 ·

这份大字报标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然而广而传知的却是《外交部“91人大字报”》。一提起“91人大字报”，就知道是那份由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陈毅的署名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像外交部这样重要的部门，91名中高层干部联合署名，态度鲜明地支持与保护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陈毅，这种逆潮流而上是当时罕有的事情。尤其是在这91人中有不少人早就是社会熟知的人物，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仍在外交部重要岗位上坚持工作的领导干部，更是引人注目。因此，梳理清楚“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就可以由表及里地认识、了解这批老外交官的优秀品德；就能够去伪存真，重新展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一幕，让后人看到她的历史价值。

#### 一、大字报的起草和主要内容

1967年年底的一天，北京正值寒冬季节。呼啸的北风卷起砂石扑向夜晚在街上匆匆行走的人群，似乎是在催促人们早点回家睡觉。夜晚上11点左右，位于北京报房胡同99号外交部宿舍楼内，灯光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唯独有一家的灯光仍然闪烁着光亮，这是余湛家。这里，在窄小的客厅里，聚集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谈论着，时而发出赞许声，时而又在争论不休，这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外交官在对文化大革命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像这样的“政治沙龙”近期频频举行，参加的人员大多数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有余湛、章文晋、宋之光、康矛召、张世杰等人，也有外来的，像住在报房胡同69号的陈楚，住在豫王坟的韩叙等人。

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的时间了，开始具有的新奇感和热情已经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困扰与疑惑。尤其是近几个月外交部内外“打倒陈毅”的口号、大字报日益增多，气焰嚣张，使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敏锐的政治嗅觉又让他们感到在“打倒陈毅”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更让他们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像陈毅那样

功勋卓著、文武兼备、人品高尚、名扬四海的人要被打倒？为什么在近期频频发生严重的涉外事件？为什么建国17年来新中国的外交偏要被扣上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跳梁小丑竟然妄想当外交部长？……在无数次的讨论、争论、研究、探索、思考之中，这批外交官捋清了一个主题思想，即“保卫陈毅，狠批极左思潮”。他们对喊“打倒陈毅”的人也作了具体分析，一种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对此一定要迎头痛击，以正气压倒邪气；另一种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认为越“左”越革命，调子越高越有造反精神，他们并不了解真相，对这些跟着跑的人要讲清事实，以理说服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他们认为写一份阐明观点、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大字报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闲谈变为行动。在提纲拟订好之后，有的人开始起草稿件，有的人收集资料，有的人四处联络人员，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况下稳步进行的。据佐伊阿姨讲：“当时因为那些核心人员的身份不宜去看大字报，我与季尼组成一对搭档，到外交部大字报集中的地方去看、抄大字报。我是远视眼，季尼是近视眼，她学过速记，于是我念稿季尼记录，将那些攻击陈毅的大字报内容抄下来提供给起草大字报的人作为参考资料。大字报的起草、前期运作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一般‘政治沙龙会’是由余湛、陈楚主持；大字报是由韩叙负责起草；赵政一负责对外联络。在每次大字报草稿写成后都交给串联好的小组研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大字报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运笔着色、铺纸挥毫，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第四稿。”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大字报的形成过程及思路，现将葛绮云阿姨提供的韩叙在当时写的检查摘录如下：

#### 交待草拟九十一人大字报中的一些构思情况

一、九十一人大字报的提纲是我整理的，“把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的标题是我加的。当时的想法就是陈毅同志不是敌人，可是被当成敌我矛盾对待了，因此要把是非颠倒过来，这实际就是翻案。

提纲共分四段，第一段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我提出来的。我当时引用了江青同志去年一月说过在关键时刻陈毅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话，还提到毛主席在接见刚果（布）总统时对陈毅曾有评论，后来大家认为这段话不好公开引用，以后就谈到可以用各历史阶段陈毅同志的表现来说明这问题。第二段打倒陈毅的口号是阶级敌人提出来的。第三段驳几种谬论，第四段严重的危害，主要思想都是张彤讲的，大家作了一些补充。然后，我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以后草拟大字报是以这个提纲为基础的。

二、草拟九十一人大字报所用的材料主要是自革命造反报，联络站大事记，陈总一月二十四日检查和张殿清的大字报上找的。

三、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第二稿标题是《“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彻底批判》是陈楚提出，我们同意的。第三稿改成《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也是陈楚提议，我们同意的。当时陈楚的理由是既然这一口号是阶级敌人提出的，它的本质就是反动的，而且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打倒余湛，打倒陈楚，甚至打倒姬乔都不能算反动口号。可是打倒陈毅性质就不同，因为这是关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过群众喊这个口号是战斗的口号，而是认为一概都错了。

四、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第二稿中有一段叙述我们这些干部和陈毅同志共事中受到了他的教益，这是根据刘新权同志提议写起来的。记得在讨论提纲时刘新权说，在谈陈总错误的同时也要把陈总正确言论放上去。例如陈总在一次司长会上讲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时代，就看你对列宁主义的态度。到今天则要看你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如何。这些精辟的讲话也要用，因



为听了陈毅讲话后，使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了。后来这一段在第三稿时删掉未用。

## 五、给陈毅评功摆好部分。

第四稿原来有两次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字句，原来改成犯过错误，可能是根据柯华串联组的意见改的，理由是说关于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我们只听陈毅自己说，没有听中央在文件上这么讲过，因此不必写得这么具体，这实际是想减轻陈毅的错误，姚广、杨克明那个串联组曾建议要把古田会议时，陈总把毛主席请回来一段写上。余湛同我们商议后没有采纳，理由是如果只写把毛主席请回来，不写把毛主席反对走不合适。

关于1940年那一段是根据毛泽东选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篇文章的注释写的。

说陈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陈楚提议的。

六、关于“采用各种卑劣手法”那一段，在议论提纲时只说了四种情况：1.不能说和刘少奇在新四军一起工作就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2.关于和苏加诺“统帅”“元帅”的谈话问题；3.冯耳元问题；4.我记不清（记录上有）。到第二稿时凑成了十种，最后定稿时变成了十一种，这是在写稿过程中逐步凑起来的。

在取舍这些材料中，关于陈毅同志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题词问题，有人曾提出不要，认为这个错误并不小，但记得刘新权说过这个题词是抄主席的话。还有个原因是陈楚考虑，要去掉这一段，就没有批驳说陈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例子了，因而留下。这才真正是大事化小，把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说成是缺点，这实际也是替陈翻案。

关于同苏加诺谈话的例子，是在讨论提纲时张彤和我提出的，我在写稿时建议写上去的。关于1965年记者招待会谈话的例子，听余湛说是仲曦东大使提议加上的。

七、关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一段原来没有，我同赵政一曾建议要谈一下极“左”思潮问题，并且提过可以写敌人利用极“左”思潮，极“左”思潮掩护敌人，可是这个建议陈楚未接受。当时我的活思想就是想把极“左”思潮的危害讲一讲，引起人们的警觉，想说明王力的阴谋能搞起来，是因为利用了极“左”思潮。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因为我的右倾保守思想，否定了革命群众运动。把革命群众出于对陈毅错误的义愤而表现的革命行动，也当成是极“左”思潮一古脑地否定了。

陈楚原曾提议用过《极左思潮是敌人的同盟军》的小标题，后来又改成《极“左”思潮的泛滥》。

至于批驳“把彻底批判陈姬乔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一段完全是接受乔冠华的意见而增加的，原来第三稿没有，到第四稿才加上。

八、关于陈总回来要先做检查问题，刘华秋同志提过我也反映过这种意见，但余湛讲应该相信陈总有毛泽东思想，陈总回来一定要检查，我们为什么还要提，我当时接受了他的意见，因此九十一人大字报中把刘华秋同志加的“尽快检查”给删掉了。

九、在第三稿写好后，在我们串联组讨论时，林兆南表示他同意这张大字报，但他没有资格签字，他对大字报提了点意见，他说经过这段文化大革命，大家对陈总的阶级感情加深了，

因此在第四稿最后一段中加了“更深的阶级感情”几个字。

韩叙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 二、蒙受冤屈

1968年，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中，大权依然把持在江青手中。“91人大字报”亮相于1968年2月13日，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成为“右倾翻案风”，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于是，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从批极左思潮、抓坏人的方向转为批判“右倾翻案风”。风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

当“91人大字报”贴出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到陈毅家中汇报工作时兴奋地告诉陈毅这个好消息，并将大字报的重点内容复述给陈毅听。陈毅听后，十分感慨，沉思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当然好，但弄不好写这样的大字报又是给我帮倒忙啊！”

2月24日，当周恩来总理获知在外交部贴出的这份大字报时，由于正在处理解决全国铁路瘫痪问题，抽不出身来，就让秘书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转告他的意见：把大字报撤下来；要求写大字报的人作检查；要求外交部党委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并对91人犯的“原则错误”进行批判。还特别强调：“现在又是二月，去年二月的情况不应再出现。”第二天上午，又再次让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说：“91位同志、部党组和‘大联筹’都要表态，不表态不批判，极‘左’思潮又要出来。部党委不表态，就站不住脚。如果部党委不表态，我就来表态。”后来周总理在见到参与写大字报的司长们时，又严厉地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事先给他看一下。

当陈毅知道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后，于2月28日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表态赞同周总理的处理意见，并愿意为91人犯的“错误”承担责任。3月1日，外交部以大字报形式贴出陈毅给周总理的信作为陈毅的书面检查。3月6日，陈毅在外交部“大联筹”召开的大会上作了检查，他说：“这张大字报以‘打倒陈毅’的口号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是错误的。”又说：“‘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根据我的一些错误提出的，希望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也来揭发我的错误。”这就是陈毅为保护自己的部下免受批斗，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下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了，即将“错误”招惹来的火力引向自己的胸膛。

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使大字报的发起者们陷入困境，一时难以接受，也发了不少牢骚，余湛曾说过：“帮倒忙也是帮忙，总比那些不帮忙的要强呀！”他们弄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一直是竭尽全力保护陈毅，而他们保卫陈毅的大字报为什么却是犯了“原则错误”？他们理解不了大字报是在批判极左思潮怎么就成了“为右倾翻案”之作？在酝酿写大字报的过程中，他们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不惧怕由此而带来的挨斗受批。但是对来自他们最敬爱的周总理的批评，使他们感觉到了压力的沉重和事情的复杂性。他们是周总理亲手培养和率领的“文装解放军”中的骨干成员，周总理的话他们是要听的。于是，余湛、陈楚、韩叙、赵政一重新聚集在一起，代表大家写了一份检查。检查在2月25日深夜写好，连夜抄成大字报。检查中承认“91人大字报”有“否定一切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既没有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的群众区别开来，“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份两千余字的大字报于2月26日一大早在外交部贴出后又一次引起众人的关注。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从批极左思潮又转为批“右倾翻案风”后，前段时间低着头的造反派们又趾高气扬起来。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在所属单位都做了检查，受到批判。韩叙一连做了1

0次检查才算过关。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写的大字报也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而且造反派们认为耿飚、黄镇等人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对他们的批斗上纲为“耿、黄反党集团”，在批斗会上常常喊出“打倒耿、黄反党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造反派在审问黄镇追查大字报的后台时，黄镇面不改色地回答：“就是我和老耿商量着写的，其他大使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耿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忽悠了造反派们一把。他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不在幕后！”“在哪里？他是谁？”造反派们面露喜色，以为找到了突破口，得到重要材料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邀功请赏去了。只见耿飚不慌不忙地用手指向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呀！”气得造反派大呼“耿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耿飚！”。造反派在这些软硬不吃的大使面前无计可施，于是除了七斗八斗、让写检查及交代材料之外，对这些六十来岁的老人加重惩罚体力劳动的强度。

我在采访曾涛夫人朱黎青时，听她讲述了因为大字报而牵连到她女儿工作分配一事：她的三女儿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毕业分配时学院里的造反派说她父亲是“走资派”，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不能分配到保密的军工系统工作。当时学院的工宣队的队长是个老工人，他说：“她父亲是大使，那‘91人大字报’也是大使写的，他父亲怎么就成了后台呢？”最后，还是将她女儿分配到西安的一个军工厂里工作了。

面对所受到的委屈，这批久经沙场的“老兵”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人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被颠倒了的是非一定能够得到重新的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91位签名者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被“打倒”，“官位”并没有丢，而且工作的重担越来越重。在耿飚、黄镇担任“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和毛主席讲“我还是喜欢91人的”话之后，戴在91位大字报签名者及持相同观点人头上“为右倾翻案”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这时，他们才逐步理解了周恩来总理的良苦用心。

在研究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在对待“26位大使的大字报”与“91人大字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周总理对“26位大使的大字报”没有明确反对，是默许；对“91人大字报”则是严厉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呢？在此谈些个人见解：第一，“26位大使的大字报”和“91人大字报”的参与者当时并不能完全感触与把握到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取向和形势发展的估量，因此时机的因素使得两份大字报遇到不同的结果。当毛泽东决定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时，是想纠正极左思潮造成的太大偏差，这样“26位大使的大字报”正逢其时；而“91人大字报”却在机遇上遭遇逆势，从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的动向来看，并未清除与终止极左思潮的影响，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使极左思潮更加合法化了。站在中国政治最高层的周恩来总理，对这种政治态势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一份“91人大字报”并不能击垮极左思潮，反而会授人以柄。识大势才能谋大略，所以及时撤回“先锋部队”，保存实力，是最明智的做法。第二，周恩来总理出于保护这批干部而采取批判他们的做法。这句话从逻辑分析上可能会有些矛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就是如此。如果周恩来总理力保这批干部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一是保不住，二是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步。只有主动让他们“认错”，才有机会保存住这批干部，以备今后随时将他们放到重要岗位上去。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保荐耿飚、黄镇为党中央委员，从重新安排出国的大使，从外交部重要岗位的安排，都是从这批信得过的干部中选用的。

三、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迅速组建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符浩为秘书长，陈楚、熊向晖、唐明照为成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大会。在代表团临动身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当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介绍符浩、陈楚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的，

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91人？”毛主席略为思索了一下，记起外交部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将扣在91人及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为右倾翻案的典型”的罪名解脱了。

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去分析判断，用历史验证的尺子去衡量，“91人大字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保卫陈毅。为什么这样评价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所有正确的选择，事后看来都可能被认为是简单的，但回到历史的现场与具体时空，如何选择恐怕就不是件容易做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不敢讲的话他们讲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做了，别人不敢坚持的原则他们坚持了，而且历史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这就是“91人大字报”的历史价值。

□ 《世纪》2010年第4期

~~~~~  
【人物春秋】

叶向真：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

• 周海滨 •

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在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里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他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不难想象，这个叶剑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当年一定是绿荫叠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机盎然。凌孜说，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凌孜历历在目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文革岁月。

◇ 红卫兵与总理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

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 he 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儿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

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趁提审时，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时，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担心我会傻掉，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我身体恢复基本正常（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我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

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我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我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他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父亲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

高中时我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叶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

但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但是，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片。

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让我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原野》之后，我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孜挥别影坛）。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对于我的文革经历，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 《看历史》2010年第10期
~~~~~  
【历史见证】

我参加彭德怀专案组的外调工作

• 汪春耀 •

1967年7月至1968年3月，我从公安部抽调到设在国防部大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工作。（简称“罗案组”，1967年10月中央专案小组分设一、二、三办后，“罗案组”归属“二办”，迁移到总参翠微路招待所内，当时“彭德怀专案组”简称“彭案组”也迁移到翠微路招待所——作者注）1967年11月间，我经“罗案组”党支部推荐临时借去“彭案组”，随“彭案组”谢处长（时任总政干部部副部长）、甘霖（时任总政干部部干事）出差长沙核查彭德怀“叛徒”问题的材料。虽然去长沙不到10天，我却记忆深刻。

由于那时两个专案组同在一个院内，而专案组的人几乎是昼夜在那里，又同在一个餐厅就餐，所以我同谢、甘二人并不陌生。当我向谢处长报到后，他向我介绍了出差长沙的任务，大意是说“江办”（即江青办公室）转下一件湖南有个在押犯检举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谢说这件材料看来有点“悬”（之前“罗案组”也曾有“江办”或“叶办”转下安徽一劳改犯检举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经“罗案组”核查否定——作者注），必须抓紧核查。谢对我说因你熟悉公安系统和外调工作，就临时借你同去一趟。我表态说我就当个小参谋，一切听谢处长的。第二天我们三人乘特快到长沙。那时湖南刚成立以黎原（47军军长）为主任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简称“省革筹”）。长沙省、市两级机关和重要单位均由47军派军代表管理。我们一到长沙，持军委办公厅介绍信，立即向黎军长报告来湘的任务，黎马上召来军保卫处长配合我们工作，主要是由他同公安厅等单位军代表联系和安排住地，提供交通工具，我们住入军部招待所。黎军长并嘱告有何困难可找分管政工的李副政委解决。故我们的外调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首先我们到省公安厅档案馆等单位，用二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以及1927年到1929年间湖南的旧报刊，丝毫没有发现彭德怀是“叛徒”的蛛丝马迹。接着我们就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提审那个提供材料的在押犯（该人是个老叛徒，名字已忘）。提审前，我们三人连夜调阅了该犯全部案卷，摘录了该犯案情，拟就了审讯提纲，重点是审问他叛变前后的社会关系。审讯前谢处长对我说由你当主审人为好，我也不好推辞。对这个老叛徒审问了近半天的时间，先从审问他的历史开始，然后转入审问他叛变前后的社会关系。审讯中，我严正地问他“你社会关系中有没有省里和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答：“省里的有如吴自立等……，中央的没有。”再审问几个小回合，我就突然发问“认识彭德怀吗？”他立即答：“不认识他。”此时在旁的谢处长就略点点头。接下来我们立刻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好审讯笔录，交该犯看过无误后，他签了名，按了手印，结束了审讯。这趟审讯这个老叛徒，他连彭德怀也不认识，怎么会有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呢！对于这一谜团，当我们离开看守所时，一位老所长对我们说，47军没有进驻看守所前，这里曾短期失控，被一些造反派闯进来胡乱审过犯人。老所长这么一说，使我们有了破解谜团之感。这就是“江办”转下所谓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的源头吧。一两天后我们返京，我仍回“罗案组”。这趟不到10天的出差，却让我记住了文革中“江办”曾向“彭案组”送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被当时的“彭案组”及时核查给否定的事实。

1968年3月我离开“罗案组”几个月后，听说谢处长、甘霖离开了“彭案组”，后来又调离北京。因我仅与他俩只有不到10天在一起做外调工作，故至今未有联系，但我们在这次外调工作中，心却是相通的。

（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

□ 《世纪》2010年第4期

~~~~~


【史实考证】

中共十大后中央军委组成情况考析

• 黄力民 •

“文革”期间中央领导机构多有异乎寻常的情形发生，1973年十大后的中央军委组成就是其中一例。

现存的党代表大会后组建新军委做法始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为适应此一情形，次年的十二大党章首次在“党的中央组织”条目写入军委组成人员的内容，十二届一中全会决定新一届军委成员并即时在媒体公布（可称为第十二届中央军委）。此后第十二届中央军委的模式遂形成定制。

十二大以前的党章不含军委组成的内容，军委的组建自然也不一定与党代表大会的换届同步，但又确有1969年九大后即组建新军委的情形，致使有关资料对于1973年十大后军委的组成说法不一或含糊不清。本文考析1973年十大后军委的组成问题，之前先简要列举第十二届军委前的各届军委。

◇ 建国后至十二大前的历届军委概况

1、1949年军委（即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1949年10月19日成立，设主席、副主席、委员。

军委委员28人，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增补林彪、高岗为副主席。1954年6月19日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委员。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先后是周恩来、林彪（1951年10月至1952年初）、周恩来、彭德怀。

2、1954年军委（1949年以后首次成立中共中央军委）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通知成立，设主席、委员。

军委委员12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年9月31日决定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任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56年11月增加委员10人。

3、1959年军委

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军委设主席、

副主席、常委、委员。

军委由21人组成，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委员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肖华、刘亚楼、苏振华。其中主席、副主席以及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共13人为常委，罗瑞卿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为副秘书长。

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增补肖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3年9月，因林彪有病决定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1月增加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4名副主席。5月23日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后由叶剑英、杨成武、肖华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

1967年3月增补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委。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吴法宪负责。9月底正式称为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1968年3月黄永胜取代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4、1969年军委、或称第九届中央军委

中共九大后成立，设主席、副主席、委员。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举行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另有42名委员（很特殊的说法——不说共有49名委员，可能因为当年公布名单时毛泽东、林彪之名必须突出在前）。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人组成。

5、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闭幕，29日军委提出军委63人名单方案是：原军委委员保留28人、增补35名委员，30日十届一中全会依案批准军委方案。

1973年10月增补王洪文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2月22日增补邓小平为委员，1975年1月5日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1月8—10日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任中央副主席。

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将上年1月成立、受权处理南沙作战日常工作的6人小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增加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4人成立军委常委会。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撤销始于1971年10月的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常务委员会成员除叶剑英建议的10人另加汪东兴。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军委主席。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协助。同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

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军委副主席职务。

6、1977年第十一届军委

中共十一大后组建，由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组成。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军委组成为63名委员，包括主席以及5名副主席8名常委，但并不在全会公报公布，关于军委的组成也未写入党章。

◇ 十大后的中央军委不是新一届军委

对比以上情况可看出，1973年十大后军委的组成与其他各届有很大不同。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记述：“1973：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批准中央军委提出的新一届中央军委委员63人。其中原军委委员保留28人：毛泽东、……。新增补的军委委员35人：王洪文、……”（亦见于李可、郝生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采用的是“批准”军委提案的方式而不是十届一中全会本身的决定，虽称“新一届中央军委”但又没有完整列出军委组成人员名单。一些资料所以说不明白1973年军委组成情况大抵是误认为党代会的换届必伴随有军委的组建。笔者认为1973年十大后军委不是新一届军委而是在1969年第九届中央军委基础上的调整，理由如下：

1、资料记载是“原军委委员保留28人”（包括1名主席4名副主席另23名委员），未公布军委组成人员名单——既没有将原委员与新委员名单按某种排序混合公布，也没有主席副主席名单，特别是后者应当理解为原军委主席、副主席人选不变，即是对1969年军委的调整。如果1973年军委是新一届军委，又没有副主席名单，则如同1954年军委系由主席、委员组成而不设副主席。如此就不能解释1975年1月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在林彪地位非常突出时1969年第九届中央军委尚且不是仅设一位副主席，而以邓小平当时的情况不大可能任唯一的副主席。

2、在《叶剑英大事年表》中有“1949年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2日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26日任中央军委常委”，“1966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1977年8月25日”、“1982年9月13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没有1973年军委任职的记载。

3、1973年8月后，军委委员未续任的21人中林彪、陈毅等7人实已去世，在世的14人（王秉璋、王效禹、王辉球、刘丰、李作鹏、李雪峰、吴法宪、邱会作、郑维山、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温玉成、潘复生）恰好是当时整肃对象或已失势，对1969年军委进行调整而不是换届亦表明这14人属于因过失免职或撤职。

4、成立新一届军委时必定还要解决军委日常工作的运作方式，而1973年8月底并未就此做出安排，那么继续沿用1971年10月3日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也意味着只是调整军委组成人员。

然而若认为1973年军委是1969年军委的调整（均未设常委），也有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建议成立军委常委会，为何将已是副主席的他本人与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又加常委头衔，而主席毛泽东却不是常委？笔者认为这可能是

对“常委”一词的使用不当所致。此处须先解释一下军委的议事架构。

1949年10月至1971年“九一三”前军委议事架构为“主席—第一副手—办事机构”三层次，其中第一、二层是个人（副主席、常委可能在第二层起一定作用），第三层是集体。担任过第一副手的依次是周恩来、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在林彪有病期间曾由贺龙代理）。“九一三”之后，显然没有可以充当军委第一副手的人选，军委议事架构变为“主席—办事机构”两层次。例如1975年2月5日中央通知“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这与称“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不同的。当然，在两层次架构的情况“办事机构”这一层次的地位必定上升。

十届一中全会批准的是中央军委提出的调整方案，理应就是或主要是叶剑英的主张。推测叶剑英的想法是：当时王洪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已明确，若提出组建十大后新的军委，毛泽东定会通盘考虑，王洪文有可能任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张春桥在军委地位也会上升，军委的议事架构重新成为“主席—第一副手—办事机构”三层次，这是叶剑英与其他军队元老不愿看到的。事实上十届一中全会后仅两个月王洪文即增补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表明毛泽东已意识到作为党接班人的王洪文应当在军委有相应的地位。

1975年伊始，形势似乎转好——1月5日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8—10日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任中央副主席，加之王洪文势头有所减弱而党接班人空缺。叶剑英即于1月26日提出成立军委常委会的建议。结果是2月5日中央通知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成员除叶提出的10人又加汪东兴。

历史上军委办事机构曾使用不同名称，在设常委的1959年军委是“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建议成立的“军委常委会”应当是为办事机构拟定的新名称。但是办事机构是要天天碰头开会的（可见于吴法宪等人回忆），办事机构（除领衔者外）也从未有过元帅级别的成员，叶剑英将多病年迈的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纳入军委常委会不过是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必要时可增加议决票数。1971年“九一三”之前的办事机构全由军事部门负责人组成，而自1971年10月3日组建的军委办事机构开始则有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这样非军事部门负责人加入，此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毛泽东去世时。叶剑英将3名副主席与粟裕加入“常委会”既能平抑王洪文、张春桥的地位又不至于引起毛泽东的反感。

因此，考虑到1969年军委组成（本届军委延续到1977年十一大）并未设常委，叶剑英1975年1月26日关于成立军委常委会的建议既是解决军委办事机构的设置问题，又有提高军队元老地位的用意，这应当是“常委会”的虚虚实实两方面，是“文革”期间最高权力配置异常的一个写照。

□ 《党史博采·纪实版》2010年第9期

~~~~~

#### 【文献资料】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 许广平 •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今天，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开这样的大会，隆重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使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

我深深感到，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叫作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作“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他把自己全副精力放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作上。他像哨兵一样，时刻关心着文化战线上的动向，并投身于战斗的行列中去；他为党培育文化新军，不辞劳瘁，不避艰险；他节衣缩食地来支持党的文化出版物；……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鲁迅曾经专门拍电报前去致敬和祝贺。鲁迅满怀热情地在电报中欢呼：“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鲁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就清醒地看到，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不但将赢得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也将给全人类带来无穷的希望。我们从鲁迅逝世前不久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更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倾心热爱毛主席。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公开宣告自己能作为毛主席的一个同志，是很大的光荣。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政治战线、军事战线上的最高统帅，也是我们文化战线上的最高统帅。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鲁迅正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高举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把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信徒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的反动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使“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遭到了破产。使周扬们恨得发狂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正是鲁迅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而提出的。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那些处心积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周扬之流，对鲁迅恨之入骨。他们想出各种恶毒的手段来迫害鲁迅。周扬曾化名芷因，亲自在小报上写文章攻击鲁迅。正当鲁迅大病，

医生拟议易地休养的时候，徐懋庸“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致使鲁迅不但病未减退，反而病势加重，不能旅行外地，终于不起。鲁迅的死，是同周扬们对他的迫害直接相关的。周扬们不但在鲁迅生前攻击他，死后还是攻击他，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周扬之流还利用出版《鲁迅全集》的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颠倒历史，美化自己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把一个“左倾宗派主义”的恶名加在鲁迅头上。还有一个成仿吾，一直到一九五九年还在污蔑鲁迅。他们满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窃取的权位，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光辉夺目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了鲁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周扬之流的阴谋被揭穿了，使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

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们更加懂得了：谁拥护毛主席，谁站在毛主席一边，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他就能为人民作出贡献。谁要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抵制毛主席的路线，谁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拥护毛主席路线的鲁迅，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反对毛主席路线的周扬之流，成了渺小的修正主义者。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

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有些人，起初参加了斗争，后来就“开小差”了。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我记得，他早就识破夏衍、潘汉年不是好人，见面的时候，他从不给我作介绍。

鲁迅在他漫长的战斗生活中，常常受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机会主义者的进攻。对机会主义者，鲁迅是十分警惕的，并且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愿意努力学习鲁迅的榜样，同红卫兵小将一起，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因此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中间引起惊惶不安和疯狂谩骂。他们造谣言，放毒箭，恶毒攻击我们“毁灭文化”、“毁灭作家”，他们还下流无耻地企图歪曲鲁迅的光辉形象，妄想把鲁迅放在我国文化革命的对立面，以攻击、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联修正主义的老爷们，在这方面就特别大卖力气。他们颠倒黑白，硬把鲁迅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歪曲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胡说什么鲁迅的思想，具有“反战倾向”的“人道主义性质”。

我最近看到《苏联妇女》杂志以“纪念鲁迅诞辰八十五周年”为名，发表了一篇十年前曾经访问过我的一个人的文章，文章中竟然这样说：“随着许广平的回忆，简直不能不把鲁迅的许多生活特点和俄国伟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的活动和他们在俄国革命青年中的无比的声望和影响相对比。”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需要，这个家伙丝毫不敢提到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而和我们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遥相呼应，把周扬之流竭力吹捧的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来比拟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他自己这样说不算，还要强加于我。这是极端无耻的造谣。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沉重地打击了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样也最沉重地打击了国外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无论他们怎样垂死挣扎，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是注定了的，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 原载《红旗》1966年第14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